大学校长与中国近代大学精神的本土化

李玉胜

(南京邮电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3)

摘要: 中国大学精神随着中华文化的发展而演进,在守望自身逻辑发展的基础上,吸纳了西方大学精神的精髓,不断地融合、创新,形成了近代大学各具特色的大学精神。这些大学在其校长的先进治校理念倡导下,造就了可贵的德治精神、自由精神、自治精神与爱国精神,并对中国近现代大学精神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大学校长; 德治; 自由; 自治; 爱国; 大学精神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14)01-0093-07

中国大学精神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积淀和选择的过程,也是东西方文化互相交流和融合的结果,是以中国自古以来传统的大学精神为基础,借鉴和融合西方大学精神的本土化过程。在这漫长的过程中,以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近代大学校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是中国大学精神形成的先驱者。因此,中国近代大学精神的内涵是中西大学精神的融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德治的精神

(一) 蔡元培强调“兼容并包,有容乃大”,是对大学精神的完满诠释,也开启了中国近代大学精神

储朝辉博士说过,“德治”是中国大学精神久远的根基^[1]。在古代,大学始终是把德育放在首位。到了近代,大学精神的演进仍然是遵循自身的逻辑——大学之“道”来发展的。随着历史的演进,德治仍然是近代大学精神的重要价值之一。

蔡元培强调“兼容并包,有容乃大”,是他精通

古今中外学问、取中西文化精华融合壮大之产物。北大的这种精神,正是对传统儒家“和而不同”思想的现实运用。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确定的治校方针是“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2]。兼容并包,就是大学要广泛汲取人类积累下来的文明成果和学术知识,允许各种学说和各家各派相互竞争、自由发展。为了引导北大师生专心研究学问和追求学问,而不是投身教育又心有旁骛,不是在校求学又惦记着读书做官,蔡元培努力培育着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风气。他公开宣称“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3]这就给北大师生研究学问、发表见解创造了一种宽松的环境。

蔡元培采取多种措施将北大引向学术研究的同时,还努力提高师生的道德修养。他刚上任时,就要求学生砥砺德行、敬爱师长。老北大缺乏高尚的娱乐和自发的组织,学生只好到校外寻求不正当消遣。为此,他倡导成立了体育会、书法研究会、演剧会等

收稿日期: 2013-12-12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GK-213031)

作者简介: 李玉胜(1970-),男,江苏盐城人,副教授。

社团,以培养学生的正当兴趣。对于那些有学识但私生活糜烂的教员,他坚决予以解聘。蔡元培还将“敬德会”组织引入北大,以此提高师生的道德修养。

(二) 梅贻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立足传统精神,成就了清华的辉煌和终身校长的美誉

梅贻琦1931年开始任清华大学校长。抗战时期,他实际主持西南联大校务;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台湾新竹另建“清华大学”,继续担任校长直到去世。因此他被称为清华大学的“终身校长”。梅贻琦在主持清华大学期间,为校友题字时,总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共勉。他的办学理念,可看作是实践清华校训的成果之一。

梅贻琦作为清华人,长期受到清华校训的熏陶,因而能将校训精神付诸于办学实践之中,他在就任清华大学校长发表的演说中指出“我希望,清华大学学术研究方面,应向高深专精方面去做。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清华的经济和环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所以我们要向这方面努力。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4]

教授的责任,不仅在于教学和研究,而且还必须以人格去影响学生;即不仅应“厚吾之德”,而且还应“厚人之德”。如此,才可能将“厚德”与“载物”联为一体。他在1932年的清华大学开学典礼上指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他时时处处以身示范,勤恳治校、民主治校,从而使清华大学得以发展,并使“清华精神”发扬光大。

(三) 张伯苓“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校训,体现了中国传统大学“德治”的精神

1934年,在南开30周年校庆纪念会上,张伯苓宣布“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作为南开校训。他对此校训的诠释是,唯“公”能化私、化散,唯“能”可去愚、去病、去贫。“允公允能”足以治“愚、弱、贫、散、私”五病,造建国之人才。可见,张伯苓提倡“公能”教育,一是为了培养青年公而忘私、舍己救人的道德

观念;二是训练青年文武双全、智勇兼备,即为国效劳的能力。

南开校训中“日新月异”这4个字所蕴含的不断进取的精神,实际上是南开精神的特质。1916年9月,张伯苓在《打破保守,努力进取,建设新中国》演讲中说“吾校与他校较,各校中有进取者焉,有保守者焉。吾校进取者也。即以各校各项竞争而论,吾校所得结果如何,汝等之所共知也,此即进取之效力也。推而至于国家亦何不默然,故欲强中国,非打破保守、改持进取不可也。进取之说自古有之,《易经》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彼之所谓天行健者,乃指昼夜想承,春秋代继,无时或已,长此不怠而言也。”“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是张伯苓对南开人的希冀和要求,至今仍为南开人心口相传。校训孕育了南开精神,并使南开精神名扬全国。

二、自由的精神

(一) 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精神,奠定了中国近代大学精神的根基

从1919年开始,蔡元培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全面改革,并取得了显著效果。1923年12月17日,时任代理校长的蒋梦麟在纪念北京大学建校25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北大之精神》的演讲。他说“本校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俗语说‘宰相肚里好乘船’,这是说一个人能容,才可以做总握万机的宰相。若气度狭窄,容不了各种的人,就不配当这样的大位。……一个人如此,机关亦如此。本校自蔡先生长校以来,七八年间这个‘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了。故本校各派别均能互相相容。平时于讲堂之内,会议席上,作剧烈的辩驳和争论,一到患难的时候,便合力合作。这是已屡经试验的了。”^[5]

接着,蒋梦麟指出“思想自由”是北京大学的第二种精神。他认为“本校里面,各种思想能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压迫,故各种思想虽平时互相歧视,到了某种思想受外部压迫时,就共同来御外侮”^[5]。应该说,这标志着“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正式确立。

当代北大人不仅认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而且正在亲身践行着这一校训“循思想自由之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代表着北大百年不变的精神与灵魂。“自由的灵魂是一种高贵的姿态,它不仅仅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豁达与宽

广,更是一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孜孜不倦与身体力行。”^[6]

(二) 梅贻琦吸收了蔡元培的大学精神,成为他发展清华的思想源泉

梅贻琦吸收了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大学精神,倡导学术自由。他在《大学一解》中引用宋代胡瑗的话说“良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若夫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其无责,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弃于浅陋之学也。”^[4]梅贻琦指出“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今语释之,即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而已矣。”^[4]他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意蕴出发,指出了学术自由的重要性“新民之大业,非旦夕可期也,既非旦夕可期,则与此种事业最有关系之大学教育,与从事于此种教育之人,其之所以自处之地位,势不能不超越几分现实,其注意之所集中,势不能为一时一地之所限止,其所期望之成就,势不能为若干可以计日而待之近功。职是之故,其‘无所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思,其‘无所不言’之中,亦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言;亦正惟其所思所言,不尽合时宜,乃或不合于将来,而新文化之因素胥于是生,进步之机缘,胥于是启,而新民之大业,亦胥于是奠其基矣。”^[4]

梅贻琦还通过组织各种活动把学生的兴趣吸引到学术研究上来,如举办学术性演讲会、学术社团活动、娱乐性社团活动等,以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促进学生各方面全面发展。

(三) 南开大学、西南联大等无不吸收了蔡元培所主张的自由精神

南开大学在张伯苓的倡导下,学生自治会非常活跃。它是学生自己管理自己的机构。据1948年南开大学学生自治会编印的一份材料反映,当时这个组织已经趋于成熟。根据章程规定,该会最高权力机构是全体学生大会,立法机构是系级代表大会,执行机构是理事会,理事会从系级代表中题名,由全体学生普选产生。

除了学生自治会以外,南开大学还成立了各种学生社团,如属于研究学问的有文学会、政治学会、哲学会、经济学会等;属于服务类的有毕业同学会、平民学校、各省同乡会等;属于文化娱乐型的有唱歌会、音乐会、新剧团、旧剧研究会等。另外,还有各种类型的运动会、考察团和旅行团等临时性组织。它们一方面培养了学生的兴趣,另一方面有利于学生

之间的相互交流,增进友谊,培养一种合作和不断进取的精神。

西南联大始终将学术自由作为一种制度贯穿于整个学校的学术生活之中,正如该校学生所说“在联大里,自由研究、自由讨论是教育的主要方法,尊重个性、尊重人格是教育的主要目标。在联大里,没有强迫,只有诱导,没有盲从只有信仰。”^[7]在西南联大与政府的关系中,涉及到学术方面的事情,学校为保证学术自由,都能坚持学术的独立。1939年,西南联大四年级学生为反对教育部的毕业总考制,组织“反总考委员会”,举行罢课,甚至发生了为反总考而学生自杀事件^[8]。对于学生而言,西南联大在学术和思想方面也给予了他们高度的自由。“在联大,一件事的意见,赞成的和反对的常是这样的不一致,几小时之内,‘论战’可以贴满一墙。”^[9]

在西南联大,教师与教师之间也非常尊重彼此的学术观点。如历史系“中国通史”课,由吴晗、雷海宗、钱穆三位教师讲课,三人政治和学术观点迥异,讲法亦各有风格。但三人均能坚持己见,各自发挥而相安无事,并不会势不两立。在西南联大的教学活动中,师生双方也能坚持民主和自由。学生的学术自由首先表现为学习的自由,即选课自由、选择教师的自由和怎样学习的自由。选课可以选本系的,也可跨院系选修。如钱穆的课“选课者数十人,而旁听者数百人,以致座无虚席,门前窗外皆满”^[10]。其次,西南联大学生还能有与教师共同研讨或商榷的自由。王浩在《谁也不怕谁的日子》里回忆,“在课堂上,有些学生常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对这些学生更欣赏”^[10]。西南联大学生还有组织和参与学生社团活动的自由。学生成立社团,只需到训导处登记即可,校方不作过多限制。因而西南联大学生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在很大程度上活跃了校园学术氛围。

三、自治的精神

(一) 蔡元培的“教授治校”大学制度,既是对西方大学自治精神的吸收,又是中国传统大学精神的延续

蔡元培首先按照“教授治校”和欧美各国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原则,对学校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1917年,蔡元培在北大主持设立了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评议会由若干评议员组成。校长和各科学长为当然评议员,教授代表按

文、理、法、工各科的本科和预科分别推举两人。1919年后改为每5名教授选评议员一人,一年改选一次;可以开会选举,也可以在选票上写好姓名,寄给评议会,然后由评议会当众开票。评议会制定和审核学校的各种章程、条令,凡大学立法须经评议会通过;决定学科的废立;提出学校的预决算费用,拥有很大的权力。

评议会主要由教授组成,实际上是一个教授会,因而它也是“教授治校”的重要体现。1917年12月,学校评议会通过了各学科教授会组织法,随后由蔡元培主持分别按学科门类成立教授会。当时教员分教授、讲师、助教3种,除助教外均为教授会会员。1918年,全校成立了国文、哲学、英文、法文、德文、法律、经济、政治、数学、化学、物理共11个学科门类教授会。

1919年12月,评议会还讨论通过了学校内部组织试行章程,进一步健全学校的领导机构。这时除评议会仍为全校最高立法机关和权力机关外,还设立了以下机构:(1)设行政会议,作为全校最高的行政机构和执行机构,负责实施评议会决议的事项。(2)设教务会议和教务处,由各学系主任组成,并互相推选教务长一人(任期一年,后改为固定职务),统一领导全校的教务工作。(3)设总务处,主管全校的人事和事务工作,总务长由校长委任。这样,北大就基本确立了“教授治校”的领导体制。全校工作设立4种机构分别管理评议会司立法;行政会议及各专业委员会司行政;教务处及各系司教务;总务处司事务。

马叙伦回忆说“凡是学校的大事,都得经过评议会,尤其是聘任教授和预算两项。聘任教授有一个聘任委员会,经委员会审查,评议会通过,校长也无法干涉。教授治校的精神就在这里。”^[11]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管理体制改革,不是简单模仿、移植德国大学制度的结果,而是融合了西方大学制度精髓的本土化结果。

(二) 梅贻琦将“教授治校”贯彻得最为彻底

“教授治校”思想早在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就已奠定了基础,并开始施行了。梅贻琦的难能可贵之处,就是他作为校长,不顾他的权益会受到削弱的事实,全力加以扶植这一管理体制。从清华大学元老人物陈岱孙和朱自清的评述中,可以看出教授治校的思想对清华的发展——其实也是对中国整个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意义。

陈岱孙回忆说“在1930~1931年间,(教授治校)这个体制迅速形成。它的组织基础就是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在成文的规程上,教授会的权限很简单,只包括:审议教学及研究事业改进和学风改进方案;学生成绩的审核及学位的授予;建议评议会的事项及由校长或评议会交议的事项;互选评议员等。教授会并不经常开会,但对校内发生的大事主动过问。教授会由校长召集和主持。但教授会成员可以自行建议集会。评议会是这个体制的核心,以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学院院长及教授互选之评议员若干人组成,评议会实际上是教授会的常务机构。评议会是校内最高决策、立法和审议机构;主要的法案、章制都由评议会动议、制订。在法定地位上,评议会还是校长的咨询机构。如果说清华这个领导体制是当时所谓‘教授治校’的典型,则‘教授治校’的作用就是通过评议会的职能而表现的。”^[12]

朱自清说“在学校迁到昆明的第二年,一切渐入常规的时候,他便和校务会议诸先生决定恢复教授会和评议会。一年来开会虽然不多,但清华的民主精神已经活跃起来了。相信在梅先生的领导下,清华的民主机构,最近的将来就会恢复常态的。但这个民主的机构,由大家的力量建成,还得大家同心协力来支持……清华的民主制度,前途一定是光明灿烂的。”^[13]

由于梅贻琦依靠教授办学的民主精神,清华大学的“教授治校”制度得以确立和实施。这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为清华大学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宁静和谐的环境,对清华大学后来“黄金时代”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

(三) 张伯苓强调“师生合作”,非常尊重师生在学校管理中的权利

为实现学校的教育目标,在学校的组织管理方面,张伯苓坚持“教授治校”的民主制。他曾说过,南开不是我一个人的南开,是大家的南开,大家的事大家作。1916年他在《我之各项政策》的演讲中,指出“本校政策即将学校作成一法制学校,总不使一人之去留影响于全校……各事既有秩序,则无论何人视事均能依旧进步。其能力强者可扩充之,虽较弱者亦无退步之虞,使之坚固永久,斯本期之政策也。”^[14]1921年1月,张伯苓为了革新校务,召集南开大学教职工及学生代表约20人,在北京香山开会,制定了“校务公开,责任分担,师生合作”的方针,并成立了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师生校务研究

会”按期召集会议,讨论学生所提的议案。

张伯苓深知要办好学校,非依靠师生集体的力量不行,因此,他以“公”、“能”为标准择优聘任,使南开大学成为机构精简、队伍精干、效率较高的典型。

(四) 西南联大更是将自治精神发挥到更高境界

按照1938年国民政府颁行的《大学组织法》规定,西南联大设有校务会议和教授会。校务会议成员由常务委员、常务委员会秘书长、教务长、总务长、各学院院长及教授、副教授互选之代表11人组成。每学年由教授会民主选举产生代表(每学院至少须有1人)和候补代表(少则2人、多达12人)。校务会议由常委会主持,每学年举行一次,讨论改进校务,讨论常委会交议的事项。

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常务委员和常务委员会秘书长为当然成员。教授会是咨询机构,听取常务委员会主席报告工作,讨论学校的重大问题,向校务会议提出建议,选举参加校务会议的代表。教授会不定期举行,但每学年至少一次,开会时由常务委员会主席主持。

教授会对学校的行政管理、教学实施、学生学习等工作都有相当的影响和作用,体现了“教授治校”的精神。

由于西南联大对教师充分重视,教授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所以教授们才会像朱自清那样,感到“学校是我们大家的,谁都有一份儿”。因此,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的成就,是学校发扬民主、群策群力的结果,其关键在于为“教授治校”提供了体制上的保证。

西南联大在学生日常管理上,实行学生自主管理的模式。早在1919年,蒋梦麟就主张“我愿办学校的人奖励学生自治……我们要知道,好生活是自动的。他人代动的不是好生活。学生自治,是自动的一个方法。”^[5]西南联大坚持了这一思想。训导处的工作大纲规定“本校训导方法,注重积极的引导,行动的实践。对于学生之训练与管理,注重自治的启发,与同情的处置。”^[15]在不违反校规和法律的前提下,西南联大的学生管理主要是通过学生自治会、学生社团和学生自主活动来进行的。早在从长沙向昆明迁徙时期,西南联大成立的“湘黔滇旅行团”就很注重学生的自治能力,小队长以下全由学生担任。到昆明后,学生的生活全由学生自己管理,甚至连学生的伙食也由学生自己操办。

四、爱国的精神

(一) 蔡元培抱定教育救国的思想改造北大

张百熙任管学大臣期间,京师大学堂学生进行了爱国拒俄运动,这一运动被史学家称为中国近现代大学生爱国运动的开端。1903年沙俄不仅不按照与中国签订的《交收东三省条约》分期撤出其军队,反而增兵备战,又向清政府提出7条无理要求,阴谋把东北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京师大学堂学生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鸣钟上堂集会演讲,会后上书管学大臣请代奏拒签俄约并致书各地学堂,掀起爱国拒俄运动,引起国人关注。

北大的校庆日定在了五月四日,因为“五四”精神即北大的精神。马寅初在《北大之精神》的演讲中说“回忆母校自蔡先生执掌校务以来,力图改革,五四运动,打倒卖国贼,作人民思想之先导。此种虽斧钺加身毫无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精神当永久不死。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者。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16]

(二) 清华大学在建校之始便与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兴衰紧紧联系在一起

清华大学是个“赔款学校”,是美国用中国庚子赔款的余额建立的,美国的本意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培养一批追随美国的精神领袖,而学校偏偏又建在了被英法联军焚烧和洗劫过的清华园和近春园。清华大学学生整天面对残垣断壁,民族的耻辱时时袭上心头。当时在清华大学的吴宓曾感叹“热肠频洒伤时泪,妙手难施救国方”。“五四”时期闻一多贴出的岳飞《满江红》,主题就是雪耻。清华大学是留美预备学校,学生受美国式的教育,而在出国后却对外国人歧视黄种人非常敏感,他们与其他大学的学生相比,心中更蕴结着对民族耻辱的痛感;改成大学后,如何摆脱美国的控制、实现学术独立便成为清华大学建设的主题,而其深处的情感动因仍是雪耻。到了20世纪30年代,民族矛盾激化,梅贻琦任校长的第一次讲话没有讲学术自由,却讲了莫忘国难。梅贻琦在其就职演说中说“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关心的。不过我们要知道的救国方法极多,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我们只要看日本对于图谋中国的情形,就可

以知道了。日本田中的奏折,诸位都看过了,你看他们那种处心积虑的处在,就该知道我们救国事业的困难了。我们现在,只要紧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以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17]清华大学这种为民族雪耻的激情,在解放后,转化为建设祖国的献身意志。“文革”后这种耻辱感重新转化为办世界一流大学的强大动力。“明耻”是清华精神的重要表征:耻本学科水准不如校内先进学科;耻清华某些方面不如国内兄弟院校。知耻而后勇,清华人的耻辱感是民族耻辱感与个人耻辱感的综合,是一种忧患意识的表现。

(三)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坚持“教育救国终不悔”

谈到南开精神,谈到张伯苓教育思想,人们首先联想到的是爱国主义。他坚持将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摆在首要位置。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张伯苓义愤填膺,认为海军报国无望,决定退役,选择从事教育,以图长远报国、救国之策。他目睹了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目睹了“国帜三易”的奇耻,更加坚定了他一生的爱国热忱^[18]。

张伯苓从教育救国、教育兴国的宗旨出发,把培养“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19]。他说“教育范围绝不可限于书本教育、智育教育,而应特别着手于人格教育、道德教育。”^[20]他认为,德育包括很深刻的内容,积极的人生观、事业心、社会公德、正直、善良、无私等多种素质,都是衡量学生品格的重要尺度。但德育之首,乃是爱国主义教育;最大的公德就是爱国;学生要成为有用之才,必须“有爱国之心兼有爱国之力”。

1927年4月,张伯苓曾亲赴东北考察,并在学校成立东北研究会,把揭露日本侵略东北的罪行作为一个重要课题。“九一八”事变后,张伯苓出于爱国义愤,根据东三省丰富的自然资源、经济状况、人文地理状况,编写了一本《东三省地理》的教材,作为高年级的必修课。张伯苓还经常向学生讲述清政府的腐败,民族危机的严重,举行各种“国耻”纪念活动,以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激情。

在“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精神的熏陶下,南开师生的爱国主义有声于时,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南开大学更是被誉为抗日的堡垒。南开大学的抗日爱国行为,激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极大仇视,因而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首先将南开大学的主要建

筑物炸毁。南开大学校园被毁后,张伯苓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灭者乃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21]据校史记载和南开校友的回忆,抗日战争期间有许多南开大学校友为国捐躯;但在战后的汉奸审判席上,没有一个是南开大学的校友。

(四) 爱国精神——最具时代性的西南联大精神

在西南联大,最感人的精神就是爱国精神。这种爱国精神经历了忧国——报国——学术救国的思路历程。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们忧心如焚,对国家和民族的危难多焦虑难安。吴宓在1937年7月14日日记中写道“阅报,知战局危迫,大祸将临。今后或则(一)华北沦亡,身为奴辱。或则(二)战争破坏,玉石俱焚……今后或自杀,或为僧,或抗节,或就义,无论若何结果,终留无穷悔恨”,并责难自己“不克振奋,不能为文天祥、顾亭林,且亦无力为吴梅村……思及此,但有自杀”^[22]。

冯友兰在南岳山中感叹“非只怀公伤往迹,亲知南渡事堪哀”,忧国之思使西南联大的教师们深知抗战时期自己的位置:以传播文化创造为维系民族血脉的使命,因而他们的爱国精神更多地体现在学术救国和文化救国上。正因为有了这种精神,西南联大教师把学术活动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如朱自清在西南联大八年时间完成了十部著作(其中3部与人合著),还开了十门课;黄子卿生活困难,又为疟疾缠身,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承担了每周36小时的教学工作,而且每次从学校返家需步行一个多小时。师范学院的萧涤非,因生活困难,甚至将第三个孩子送人抚养,仍然坚守在教学岗位上;罗庸在紧张的教学科研之余,还应老舍之约编写了许多通俗易懂的抗战文艺作品。如《老妈辞话》、《一门全节》、《汉奸自叹》等,广为流传^[23]。西南联大的学生也因有了这种精神而勤奋学习,他们吃着“八宝饭”(砂石、秕子、谷子、糠屑夹杂其中,米色又红,故名),却到图书馆排队“抢座位、抢灯光、抢参考书,教室里有人隔夜就占位置的”^[9]。在长期的战争中,西南联大的师生都生活苦难,贫困笼罩着一切,营养不良,衣衫褴褛,书籍仪器研究工具以及居屋都是非常困难、憔悴、衰颓、死亡,世局国难的苦闷、社会的辛酸……种种人间的不幸,不断地打击在他们的身上,而他们依旧坚贞不移,在继续一个永远不会终止的工作——真理的追求^[7]。

五、结 语

从大学校长的视角来看,“矢志于道”是中国近代大学精神建构的民族化或本土话语的表达方式。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已经点明大学精神的恒久性。中国大学精神沿着“明道、变道、弘道”的发展走向演绎到近代,最终与西方大学接轨,其发展的最终结果是融入大学精神发展的洪流之中,从特殊性走向普遍性,成为世界大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中国大学精神的本土化价值在于其内涵是世界主义、普遍主义和本土文化的嵌合。

参考文献:

- [1] 储朝辉. 中国大学精神的历史省思[M].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6.
- [2] 高平叔. 蔡元培全集: 第3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 [3] 高平叔. 蔡元培教育论集[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7.
- [4] 刘述礼, 黄延复. 梅贻琦教育论著选[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
- [5] 蒋梦麟, 曲士培. 蒋梦麟教育论著选[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5.
- [6] 北京大学校团委. 我心中的北大精神[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7]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南开大学, 等.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 一[M].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8.
- [8] 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 清华大学校史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9] 西南联大《除夕副刊》. 联大八年[M]. 昆明: 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 1946.
- [10] 云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34辑[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8.
- [11] 马叙伦. 我在六十岁以前[M]. 上海: 生活书店, 1947.
- [12] 梅贻琦. 梅贻琦先生纪念集[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5.
- [13] 朱自清. 朱自清经典大合集[M].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0.
- [14] 王文俊, 杨珣等, 郑志光. 张伯苓教育言论选集[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
- [15]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南开大学, 等.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 三[M].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8.
- [16] 马寅初. 马寅初演讲集: 第4集[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17] 梅贻琦. 中国的大学[M].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2.
- [18] 陈学恂. 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 上册[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
- [19] 梁吉生. 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 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3.
- [20] 高伟强, 余启咏, 何卓恩. 民国著名大学校长: 1912~1949[M].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7.
- [21] 南开大学校长办公室. 张伯苓纪念文集[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6.
- [22] 吴宓. 吴宓日记: 第6册[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8.
- [23] 刘又辛. 治学纪事[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2.

Indigenization of university presidents and university spirit in modern China

LI Yu-sheng

(School of Marxism ,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
Nanjing 210003 , Jiangsu , China)

Abstract: University spirit in China has evolv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On the basis of the logic of self development , it has absorbed the essence of western university spirit and formed it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with a dynamic fusion and innovation. Influenced by the advanced management ideas of the university presidents , morality , self-governance , freedom , and patriotism have been highly valued by these universities , which have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university spirit in modern China.

Key words: university president; morality; freedom; self-governance; patriotism; university spirit